

中国音韵学研究

〔瑞典〕高本汉 著



商務印書館

ISBN 7-100-00018-1



9 787100 000185 >

ISBN 7-100-00018-1/H·7

定 价：33.00元

中國音韻學研究

〔瑞典〕高 本 漢 著

趙元任 羅常培 李方桂 合譯

商 務 印 書 館

2003 年 6 月 · 北京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ŌNGGUÓ YĪNYÙNXUÉ YÁNJIŪ

中國音韻學研究

〔瑞典〕高本漢 著

趙元任 羅常培 李方桂 合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河北三河市藝苑印刷廠印刷

ISBN 7-100-00018-1/H·7

1940年9月第1版

開本 850 × 1168 1/32

1994年8月縮印第1版

印張 25 1/4

2003年6月第2次印刷

定價：33.00 元



N. Karlgren

出版說明

本書爲研究漢語方言與漢語古音的重要著作，法文元本在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年分四次出版；中文譯本在一九四〇年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

本書的貢獻有三項：[一]先根據《廣韻》的反切和等韻，考訂古音的音類，再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構擬古音的聲母韻母的音值。[二]說明語音的分類和性質，羅列三十來處方言的輔音元音。[三]在構擬的古音下，排比二十六處方言三千來個字音，反映古今音的演變，方音之間的異同。

譯本書前加的《譯者提綱》說明全書的要點；《名辭表》羅列本書使用的中文法文對照的語音學和音韻學名詞，並有詳細的附注；《音標對照及說明》通過瑞典方言字母與國際音標的對比，闡述使用音標的原理；這三項對閱讀本書很有幫助。

元本出版過程中和出版之後，作者對古韻母音值的構擬有所變更，這些在譯本中已經改正。譯本出版後有一項更改需要提一下。高本漢（一九五四年 268 頁）¹根據趙元任（一九四一年 225 頁）²，把“幽黝幼”三韻的音值由 iəu 改爲 iěu（照譯本的寫法是由 iǒu 改爲 iěu）。

元書有些疏忽的地方，主要是一些字的古音音類。這裏舉譯本 71 頁爲例。

譯本 71 頁（法文元本 112 頁）有“衣依椅殷慝湮掩意縊冤威畏慰淤鬱”等十五個影母字標明“三四等？”，意思是說三四等不定。現在分別說說這些字的等。

“衣依”兩字《廣韻》平聲微韻開口，“威”字合口；“畏慰”兩字去聲未韻合口。“殷慝”兩字平聲欣韻開口；“鬱”字入聲物韻合口。“冤”字平聲元韻合口。這些韻都是本書的 β 類韻，這些韻的字全在韻圖的三等。看譯本 471—472 頁（法文元本 625—626 頁）。[上頁“隱癰”兩字上聲隱韻開口；“苑婉宛”三字上聲阮韻合口，“怨”字去聲願韻合口，“謁”字入聲月韻開口；七字全列三等，不誤。]

“意”字去聲志韻。“淤”字平聲魚韻央居切又去聲御韻依倨切，現代方言一般讀平聲，此處當移到平聲。這些韻影母只有三等。[上頁平聲之韻“醫”字與魚韻“於”字都列三等，不誤。]

“椅”字譯者注云：“《廣韻》‘支’‘紙’兩見，但今多數方言讀上聲。”案《廣韻》支

1 Karlgren, Bernhard.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26. 1954. pp. 211—367.

2 Chao, Y. R.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元誤作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今據抽印本所附更正表).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 nos. 3—4. 1941. pp. 203—233.

韵：“椅，木名，梓實桐皮，”於離切。紙韵：“椅，椅柅，”於綺切。高本漢所列的“椅”當是“椅子”的“椅”。“椅子”本作“倚子”，字從人旁。“倚”字已見上頁三等，跟支韵的“椅”音義都不同，跟紙韵的“椅”音同義異。

“掩”字上聲琰韵衣儉切，跟“厭”字於琰切三四等對立。[“厭”字跟“厭”字同等，上頁列三等，應改列四等。]

“湮”字平聲真韵於真切又先韵烏前切，本書用於真切的音，見譯本 110，616—617 頁（法文元本 174，783—784 頁）。“湮，於真切”的同音字“因茵姻”三字均見上頁四等，不誤。先韵是本書的 γ 類韵，是四等韵，看譯本 472 頁（法文元本 626 頁）。

“縊”字去聲寘韵於賜切又霽韵於計切，本書用於計切的音，見譯本 97，577 頁（法文元本 154，744 頁）。霽韵也是本書的 γ 類韵，是四等韵。寘韵“倚，於義切”跟“縊，於賜切”三四等對立。

如上所說，本書所列影母十五個“三四等不定”的例字中，“湮縊”兩字為四等，其餘十三字都是三等。

同頁喻母四等開口入聲列“譯繹驛亦奕役疫”等字。譯本 714—715 頁（法文元本 881 頁）以為這七個字同音。《廣韵》入聲昔韵“繹亦奕譯驛”五字羊益切，跟同韵“役疫”兩字營隻切開合對立。“營隻切”反切上字合口，下字開口，由上字決定“役疫”兩字是合口。

諸如此類的疏忽之處，此次重印都沒有改正。讀者如有疑問，可以參考《廣韵》、《韵鏡》與《方言調查字表》。

譯本再版較初版有所改進。初版遺漏照母讀音表，再版已補上，頁碼是 291^a。472 頁正文第六行括弧中韵母初版誤排，再版已改正。現在據再版本影印。書後增一附錄。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一九八七年一月

序

瑞典高本漢先生所著之中國音韻學研究，始刊於民國四年，至十五年而完成。在其前三卷出版後，頓引起列國治漢學者之絕大興趣，我國人士治語文之學能讀法文者，亦無不引爲學術上之幸事。蓋其綜合西方學人方音研究之方法與我國歷來相傳反切等韻之學，實具承前啓後之大力，而開漢學進展上之一大關鍵也。以斯年所聞，友人中欲此書譯本流傳中土者，先後有趙元任先生，劉半農先生，胡適之先生；斯年雖於此學無所能，其願此書之吸收於漢土，亦未敢後人也。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之初，即有意逐譯此書，雖譯書不在本所計畫範圍之內，然爲此書不可不作一例外。當即由趙元任羅莘田兩先生著手翻譯，三數年中，人少事繁，譯至原書三分之一，而瀋陽之變作矣。

瀋陽變後，繼以淞滬之戰，司農仰屋，吾輩但領生活費以爲活者數月。彼時胡適之先生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事，斯年以此事商之，承其同情，慨允撥款五千餘元爲此書翻譯校改抄寫之費。當由同人商量進行之計，決定下列辦法：一、因趙元任先生彼時赴美，由羅莘田李方桂兩先生翻譯，即在此款中支付兩人月薪之半，如此者約十月；二、總持校改由趙元任先生任之，俟趙先生自美歸來，初稿既成，即可着手；三、此款餘數，用以酬校改及抄寫者。如是者一年，款罄而初稿未成，乃由本所續緒其事，期其完就。繼而元任先生悉心詳校，重寫多篇，莘田先生又改譯若干，最後丁聲樹先生亦校讀數過，然後殺青可繕寫焉。經之營之，五年乃成，雖同人在期中不專治此，然爲此銷費之功夫實超過初計之數倍矣。此固近年我國譯學上未有之巨業，瞻望明代譯天算諸賢，可無愧焉。

當時斯年與適之先生約定，在此書出版時，由我二人共寫一序，述此書翻譯之原委，並將當時交換之約定附入；在適之先生實欲彰本所諸先生翻譯之勞，在斯年亦不敢沒中基會編譯委員會贊助之功。惟自南京淪陷後，文卷久儲西州水濱，檢閱不易，而適之先生又奉使美國，當此將出版時，迫不及馳書求序，故由斯年記其大

略如此。若夫商榷質實，評讚方術，非余不治此學之人所應置喙者也。

然余因之有所感矣。學問之道不限國界，誠欲後來居上，理無故步自封。高本漢先生之成此大業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討接受吾國音韻學家之結論，實其成功主因之一，此可以本書及其後來所刊各文爲證者也。今此書行將流傳漢土，吾願國人之接受此書，一如高本漢先生之接受中土學人之定論也。

在繕寫及排字時，抄錄校對此書者，由本所楊時逢先生始終其事，謹志感謝。又此書在八一三前，已由商務印書館排版過半，經事變而版燬，卽本所自備之音標銅模亦隨以殘缺，承王雲五李伯嘉兩先生贊助，又於本年重排。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我輩於此時期，雖未能致命疆場，然譯者印者辛勤治其分內之所能，亦可略得心之所安矣。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傅斯年序於昆明。

著 者 贈 序

When my dear friend Professor Chao Yüan-jen many years ago broached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ng my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into Chinese, I was at the same time extremely glad over the kind appreciation which this proposal revealed and anxious because I saw immediately the great difficulties ahead. With the ris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great scholars in China, a book of this kind became very soon antiquated on many points and should need a very thorough revision before appearing in Chinese garb; on the other hand such a revision could not be effectuated by myself, because I had my hands full of other peremptory tasks. With the lapse of the years this disadvantage has become ever more serious, and I have to underline that if I had the chance of rewriting the whole book, I would write very differently on many points. Yet, thanks to the amiable "retouche" work executed by my able translator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y have turned it into a most supple and true Chinese form, I feel confident that it may still be of some interest and value to the Chinese philological public.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expressing my deep gratitude to all those who have furthered this translation. I am proud that eminent intellectual leaders like Mr. Hu Shǐ and Mr. Fu Sǐ-nien have encouraged the undertaking. I am deeply moved by the fact that three brilliant workers in the same field, Mr. Chao Yüan-jen, Mr. Lo Ch'ang-p'ei and Mr. Li Fang-kuei, all three authors of extremely important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all three scholars from whom I have had much to learn, have

sacrificed so much of their precious time in order to help my *Phonologie*, the child of my youth, into a new life in a milieu where it really belongs. I feel, indeed, a certain contrition, because I fear that my book did not deserve such a sacrifice.

In fact, the time is already past when a Westerner could do more than take a very modest part in the great research work bearing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re has arisen in China a phalanx of scholars with all the acumen and Chinese learning of the Ts'ing era—equals of Ku Yen-wu, Tuan Yü-ts'ai, Wang Nien-sun, Yü Yüe, Sun I-jang, Wu Ta-ch'eng and at the same time fully equipped with all the tools of modern philological and linguistic research; I wish to mention no names here but refer simply to the volumes of the *Li shī yü yen yen kiu so tsi k'an*, the *Kuo hüe ki k'an*, the *Yen king hüe pao*, the *Kin ling hüe pao*, the *Wen ch'ê ki k'an*, the *Pei p'ing t'u shu kuan kuan k'an* and many other first rate periodicals and their bibliographies. How could a Westerner ever dream of competing with them? Whereas this group of modern scholars, with their perfect command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the entire Chinese book world, can extend their activities to the whol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the only thing for a Westerner to do is to try and acquaint himself thoroughly with one small corner of the big field and there make his modest contribution. In this way, perhaps, he may still be of some service to a country, a people, a culture, which he admires and loves. This is, at any rate, the fervent wish of the writer of these lines.

Göteborg, October 5th 1936.

BERNHARD KARLGREN.

譯 文

好些年前，我的好朋友趙元任教授談到把我的中國音韻學研究譯成漢文的問題，我對於這個提議的厚意，一方面非常高興，一方面却又很發愁，因為我覺得迎頭就有很大的困難。自從中國新起了一輩學者以來，一部像這樣的書，裏頭有好些地方不久就變成不能用的陳說，要想把它譯成漢文，事先非得徹底的修改一番不可。然而這個修改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去作，因為我手裏已經堆滿了放不下的別種工作。現在過了這些年下來，這個困難一天更重似一天了，我得鄭重聲明，假使我有機會把這部書從頭到尾重寫一次的話，那一定許多地方要寫的跟以前很不相同的。現在好了，借着我這幾位翻譯先生的大力，這部書不但譯成了極其流暢極其真切的漢文，並且內容上的修改潤色也承他們的好意同時都做到了；這樣一來，我深信這部書對於中國語言學界又仍舊有相當的興趣，相當的價值了。

我趁這個機會向所有贊助這個翻譯工作的人表示我的深摯的謝意。知識界的領袖像胡適先生傅斯年先生都很鼓勵這件事，我實在覺得榮幸之至。趙元任先生，羅常培先生，李方桂先生，他們三位全是在這門學問裏極精采的工作者，對於中國語言史上全有極重要的論著，全給過我許多的益處，他們三位先生在這部書上犧牲了這麼多寶貴的光陰，使我少年時代生的這個小孩子能够在它的本鄉裏得到一條新生命——這件事是使我非常感動的。老實說，我倒是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我恐怕這部書並不值得費這麼大事。

中國民族史上的研究工作何等的大，一個西洋人再要想在這上面擔任多大一部分工作，現在其實已經不是時候了。中國新興的一班學者，他們的才力學識既比得上清代的大師如顧炎武段玉裁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吳大澂，同時又能充分運用近代文史語言學的新工具；我也不必在這裏把人名都列出來，只須舉一些刊物例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國學季刊，燕京學報，金陵學報，文哲季刊，北平圖書館館刊，此外還有許多第一流的雜誌及各種目錄。一個西洋人怎麼能妄想跟他們競

爭。這一班新學者既能充分的理解古書，身邊又有中國圖書的全部，他們當然可以研究到中國文化的一切方面；而一個西洋人就只能在這個大範圍裏選擇一小部分，作深徹的研究，求適度的貢獻而已。這樣，他對於他所敬愛的一個國家，一種民族，一系文化，或者還可以効些許的勞力。無論如何，我自己懇切的志願是如此的。

Göteborg, 十月五日, 1936

高本漢

譯 者 序

民國十年的夏天，那時高本漢的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的正文，就是原書四冊中的前三冊，剛出全了不久，丁在君先生拿了一部著者贈本送給現在譯者當中的趙君，說：“這像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可是他送給我是送錯了人了，你拿了這書一定更有用處，這部就送了給你吧”。

十三年夏，趙君到 Göteborg 初次見 Karlgren，他用很純熟而略帶山西聲調的中國話說：“我姓高，名字叫本漢，因為我本來是漢人嚟！”在那一次談話中，就開始談到了翻譯他這部 *Phonologie* 的可能。起頭的計畫是由著者把全書整個兒重編一道，使它簡單化，可讀化，然後再讓我們譯成中文。後來一直有不斷的通信，但是著者老沒有工夫來改編，而他本人跟別人的研究的新結果一天多一天，使改編的工作一天更繁難一天。到二十年秋，他寫信來說，“我近來屢次起頭，屢次擱了起來，我自己都弄膩了。你知道吧，我想最好還是讓一個新鮮的腦子來把全書編成一部可讀的書罷”。於是正式的翻譯就從這時候起頭，羅君也在這時加入，預備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刊出來。可是因為種種別的工作的打岔，翻譯到了原書 336 頁就又擱起了好久。

二十一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編譯委員會有編譯基本參考書的計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跟編譯委員會商量把高本漢這部 *Phonologie* 由兩機關合作找我們三人譯完了發刊出來。商定了譯法五條：

- (A) 將全書作一忠實能讀之翻譯；
- (B) 改其錯誤；
- (C) 加入新材料；
- (D) 改用國際音標注音；
- (E) 一部分重編。

李君就在這時加入翻譯及改編工作。翻譯的體例，正文大致用白話，腳註因為須

求簡短，並且常有通行的腳註語句可用，所以比較的文言化一點。原文中的筆誤或內容上略有疏忽的地方，著者自己現在看了也不免會抿着嘴笑的，那就不必照錯的寫了再加註來改，就直接改正了不言語了。有些應該修改的地方，如果著者自己後來已經改了，那就照新的結果改編，再註明後來的作物的見處。其餘的改動或增加的案語都是由譯者們負責。

工作的分配大致是這樣：前半部，就是第一卷初步的古音討論跟第二卷現代方言的描寫語音學，是由趙君口譯用留音機留音，由羅君對着原書聽寫成文的。後半部至字彙為止，就是第三卷歷史之部，一部分是由李君口譯，由羅君筆記下來的，一部分是兩人分別筆譯的。這第三卷羅君曾略加整理，由唐虞和周殿福兩君繕寫，油印了在北京大學作過講義用。最後第四卷的方言字彙沒有多少需用翻譯的地方，大部分只須把音表改成國際音標，把腳註中代字號碼改成漢字就成譯文了，這部分是楊君時逢寫的。所有改編跟加譯者註的地方，關於音韻方面的，羅君擔任的最多，關於語音學跟方言材料方面的，趙君擔任的最多。不過許多工作是三個人商量着做的，並不是分工不合作而拼成的七巧圖。最後由趙君把全稿從文字的可讀化，體例的一致化，跟內容的確當化三方面，跟原書對校了一遍，自己看“膩”了過後，又找了一個“新鮮的腦子”的丁君聲樹也從這三方面把全書反復細校，並且把所有查得着的引證都對核了，遇必要時或加以改正，然後才算放手。

在這中國音韻學研究脫稿的當兒，我們願意借這機會謝謝原著者高本漢教授不斷的熱心贊助跟指示。我們還要謝謝胡適之先生跟傅孟真先生因為少了他們的以催促為方式的鼓勵，這書還沒準兒到哪一世紀才出得來。最後我們少不了要謝謝丁君聲樹跟楊君時逢跟其他幫忙的各位，因為上述的他們的工作都是絕對少不了的。

一部內容這麼複雜的書，要它寫得印得一點錯誤都沒有，那是不敢希望的。所敢希望的，就是國內外學者看出無論內容或文字上的錯誤時，請隨時不吝教正為幸。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

趙元任 羅常培 李方桂 序於南京北極閣。

著者略歷

高本漢(Karlgren, Klas Bernhard Johannes)，生於1889年十月五日。1915年得 Upsala 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15至1918年任 Upsala 大學副教授，1918年起任 Göteborg 大學遠東語言文化教授，1931年起任 Göteborg 大學校長。曾來中國遊歷，並在山西住過幾年。瑞典皇家學院，瑞典歷史文學院，及丹麥皇家學院會員。中國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員。大不列顛愛爾蘭皇家亞細亞學會，巴黎亞細亞學會，及河內法蘭西遠東博古學院名譽會員。

著 作 表

(只列關於中國語言學者)

- (1)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yde, Stockholm, and Gotembourg 1915-26, 898 pp.
- (2) 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Stockholm 1918, 187 pp.
- (3) Prononciation ancienne de caractères chinois figurant dans les transcriptions bouddhiques, T'oung pao, sér. 2.19 (1920). 104-21
- (4)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nelle, Journal asiatique, 1920. 205-32
- (5)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oung pao, sér. 2.21 (1922). 1-42
- (6)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London 1923, 112 pp.
- (7)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1923, 436 pp.
- (8) A principle in the phonetic compounds of the Chinese Script, Asia major 2 (1925). 2.302-8
- (9)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Göteborgs Höskolas arsskrift 32 (1926). 3. 1-65
- (10)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Oslo, 1926, 167 pp.
- (11)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8, 769-813